

华南植物园标本采集历史纪要

胡启明，曾飞燕

标本是物种名称、形态特征、生态习性以及地理分布等诸多信息的载体，是进行分类学研究的最基本资料。一个标本馆收藏标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研究工作水平和在学术界地位的重要标志。我所创建伊始，陈焕镛教授对开展调查采集、建立标本馆十分重视。在 1934 年《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中即明确指出，本所之设立，以调查广东植物种类为首要任务，并对采集任务作出全面规划：“为求采集详尽，而无顾此失彼之弊，特将本省本部诸地，依其山脉河流地势，划为四大区，组织采集队四，每队担任一区之工作，常年往来于其所担任之区域内，循环采集，第一年各队就其各该区域内作试探采集，将各区内森林丰富之地，调查清楚，作为采集中心地，然后于第二年开始详细采集，每区每一采集地点，一年之中至少须经过两次，以求得完全之材料。除本部四区外，另一特别区，即海南岛区；该岛地居热带，植物丰富，惟交通不便，故特拟于第三年全年于该岛作详细采集”。按此规划，自 1927~1933 年，已派出采集队 109 次，前往广东境内各地、香港和海南采集，共采得标本 31836 号，至 1934 年初，馆藏标本已达 60250 号，约 15 万份，另有液浸标本 932 号，未登记者 477 号，种子标本 415 号，木材标本 425 号，可供交换的副号标本 20 余万份，成绩斐然，并与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和当时研究东亚植物的权威 E. D. Merrill 教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取得这些成绩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还经历了一场与外国势力的斗争。当时的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已在广州建校多年，生物系的 G. W. Groff、F. A. McClure、K. P. Buswell 等人也从事植物学研究，而且一直把华南视为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开始，他们并不在意陈焕镛，认为一个中国人，势单力薄，成不了大事。及至见到陈焕镛的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在 1930 年创办和发行了以英文刊印的学术期刊《Sunyatsenia》，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他们，才使这些洋教授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后来者居上，动摇了他们在这领域的主导地位，使他们难堪而又无奈。当时的生物系主任 William Hoffman 致函 E. D. Merrill，抱怨陈焕镛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并以岭南大学获得中国基金会资助为由，邀请陈焕镛开会，讨论合作，公然提出条件，要与陈焕镛约法三章：1. 双方交换标本；2. 划分势力

范围；3. 不得在同一季节考察同一地区。对于这些无理要求，陈焕镛断然拒绝，当即表示：交换标本与岭南大学获得基金资助无关，其余两项显然是在合作的幌子下强加的限制，并坦然宣称：“我来广东是为了研究广东的植物，只要我有能力，我要走遍所有的地方，在任何时间，进行尽可能多的必要的考察，完成两个目标：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收集和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以保护他们不致灭绝”。真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此后，农林植物研究所的采集工作不仅遍及广东、海南各地，还逐渐扩展到邻近各省。

陈焕镛在 1919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即用所得奖学金，只身回国，深入海南岛采集 9 个月之久，后病倒，高烧至 40.6℃，身上满布因蚂蝗叮咬和缺乏营养而形成的疮痍，左手肿大得有如带上拳击手套，最后被人用担架抬出五指山。可惜此次所采标本在起运美国之前存于上海中国商船公司仓库，几乎全部毁于一次火灾。后期采集的标本尚有 7567 号。

1949 年前我所进行大量采集工作的人员有：辛树帜（约 9000 号）、蒋英（5600 余号）、左景烈（3300 余号）、侯宽昭（4700 余号）、张宏达（2400 余号）、高锡朋（6300 余号）、刘心祈（5800 余号）、陈念劬（4800 余号）、梁向日（约 10000 号）、黄志（14000 余号）、刘瑛光（3000 余号）、陈少卿（18700 余号），为我所标本馆奠定了雄厚基础。

最为重大的事件出现在 1936 年，也是在中国的采集史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民国 25 年春，邓世纬君受聘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贵州调查员，负三年调查之责，首在黔中贵阳龙里等县调查，第一批标本业已到粤，佳品比之去年更多。原定由都匀着手南下至独山等处，后以受军事影响，遂返贵阳。即扩大组织黔贵交界之贞丰采集队，以邓君为队长，杨昌汉、黄孜文为助理，徐方才等四人为技工，于 8 月 23 日启程前往，深入该县山林最密之王母、者香、百层河一带。该处夏秋之交，盛行时疫，俗称瘴疠，10 月 13 日先死助理杨昌汉、技工徐方才，是时邓君尚将徐等棺木运回，嗣亦染病，至 17 日与助理黄孜文相继病亡，余三人亦病危。邓君聪敏勤劳，受职以来，毋旷毋懈，深入瘴区，惨罹恶疫。噩耗传至，广州同事，无不同声哀悼！盖国内为采集而死，未有如此惨者。现该所正另调黄志、陈少卿等重行组织前往黔省办理善后，继续三年调查工作”。以上文字录自 1936 年《中国植物学杂志》第 3 卷第 4 期，“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消息汇志”，至今读之，犹催人泪下。

新中国成立后除继续派遣采集人员赴各地采集外,还与研究课题和国家重大项目结合,组织多次综合性考察和植物资源普查,并将调查的范围扩展到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采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进一步提高,标本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为植物志的编研、植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以及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种质资源保存创造了良好条件。主要的考察项目有:

海南岛东路调查 1954年4-12月,进行橡胶宜林地考察,我所高蕴璋、黄成就等参加,在海南乐会、文昌、白沙、琼中、保亭、陵水、崖县调查,共采的标本971号。

广福林区调查 1955年4~12月,由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植物研究所共同组织,对广西龙胜广福林区进行采集调查,我所有何椿年、伍佰年、李志佑等参加,共采得标本1203号(1~1203),新发现甚多,其中包括活化石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 Kuang)的模式标本(广福林区00198)。

海南岛植被普查 1955~1956年,由华南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研究所、复旦大学共同组织,在海南尖峰岭林区及东方、白沙、崖县等地进行调查。我所有陈少卿、何绍颐、伍辉民、何道泉、姜英等参加,共采得标本862号。

红水河调查(I) 1957~1959年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田林、隆林、凌云山、东兰、龙津、宁明、上思、睦边、靖西、凭祥、德宝、邕宁等地开展调查,张肇骞任队长,具体工作人员有黄茂先、周远瑞、伍辉民、陈树培等,共采集标本5000余号。

中德联合考察 1958~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组织的中德考察队在广东、广西、海南进行调查,我所有王铸豪等参加,共采得标本2100余号。

湖南莽山调查 1960~1964年,黄茂先对湖南莽山先后进行2次调查,共采得标本2000余号。

海南工作站 1960~1968年,我所海南工作站陈伟球、邓良、麦浪天等人在海南岛兴隆、万宁等地采集标本共2538号。

中草药调查 1971年,林有润、林邦娟、王学文、程用谦、李泽贤在广东乳源进行中草药调查,共采得标本800号。

广东省补点调查 1973~1978年,在广东省境内部分边远和过去采集不足地区进行补点调查,先后参加工作的有陈少卿、陈德昭、谭沛祥、丘华兴、王学文、张桂才、陈邦余、陈伟球、陈忠毅、吴兆洪、龙活等,共采得标本6000余号,标本均以粤字为首,后加年份编号,如“粤-73,粤-74”等。

西沙群岛调查 (I) 1974 年 6~7 月, 屠梦照、陈邦余、伍辉民、陈伟球、曾幻添、李志佑对西沙群岛之东岛和永兴岛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209 号。

海岸调查 1980~1990 年, 陈邦余、李泽贤沿广东、海南滨海地区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5147 号。

武夷山调查 1980~1981 年, 王学文、张桂才、林有润、林邦娟对福建武夷山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949 号。

红树林调查 1981~1986 年, 高蕴璋、陈炳辉对广东、海南境内红树林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975 号。

始兴调查 1982 年, 王学文、张桂才、叶华谷、邢福武对始兴樟栋水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1154 号。

惠东调查 1982~1984 年, 陈邦余、张桂才、陈炳辉对惠东平山林场、沉水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829 号。

和平调查 1983~1984 年, 张桂才、叶华谷对和平各林区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833 号。

深圳调查 1984 年, 王学文、徐钦胜、陈炳辉在深圳各地调查, 共采得标本 551 号。

南岭山地调查 1984~1986 年, 叶华谷、陈邦余、张桂才、陈炳辉沿南岭一线, 对连山、连县、英德、曲江、乐昌、南雄、阳山、乳源、龙门、蕉岭、平远、五华、梅县、信宜、阳春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4175 号。

武陵山地调查 1988 年, 吴德邻、张桂才、刘念、叶华谷对湖南沅陵、新晃、凤凰、芷江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2704 号。

红水河调查 (II) 1989 年 4~10 月, 刘念、张桂才、叶华谷、陈海山对广西红水河地区的那坡、凌云、百色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2704 号。

广东海岛调查 1989~1992 年, 陈炳辉多次对广东沿海岛屿进行调查, 共采得标本 1369 号。

西沙群岛调查 (II) 1992 年 5 月李泽贤、邢福武对西沙永兴岛进行第二次调查, 共采得标本 188 号。

阳春调查 1990~1997 年, 刘念、张桂才、叶华谷、陈海山对阳春先后进行多次调查, 共采得标本 3140 号。

香港-深圳调查 1996~1997年，邢福武对香港进行了全面的采集，共采得标本约3000号。2000年后对深圳进行调查，共采集标本1600号。

广东-澳门调查 1979~2008年，叶华谷在广东、澳门各地调查，共采得标本18300余号。

缅甸考察 2009年3-5月，夏念和、邓云飞、周联选赴缅甸北部调查采集，共采得标本6000号。

南植地 1957~1983年，我所植物生态研究室在广东省境内以及广西部分地区开展植物生态、地理学研究，同时采集标本，参加人员主要有伍辉民、何道泉、周远瑞、敖惠修、陈树培、李志佑等。标本均以“南植地”编号，共约8000号（标本编号：101~8229）。

此外，以主要采集人编号的还有：邓良（11000号）、黄成（5000余号）、高蕴璋（1400余号）、钟义（1300余号）、罗献瑞（1300余号）、卫兆芬（2700余号）、陈泽濂（600余号）、程用谦（890余号）、黄成就（约820号）、黄淑美（约1000号）、陈德昭（980余号）、李学根（约5000号）、谭沛祥（约5900号），陈伟球（约650号）、陈同春（1600余号）、王英强（1300余号）、邓云飞（4000余号）、李世晋（1100余号）等。

标本馆收藏的丰富资料也在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我所出版了《广州植物志》，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植物学内容的植物志；1963~1977年又出版了《海南植物志》共4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通过以上工作不仅积累了经验，同时也培养了科技队伍。因此，当1958年我国决定开始编写《中国植物志》时，中国科学院特将我所陈焕镛所长上调北京，与北京植物所钱崇澍所长共同担任《中国植物志》主编，并具体负责日常工作。我所植物分类研究室也全力以赴投入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在全书80卷中，由我所主持和参加编写的共有31卷（册），58科，占总数的1/4强。可以说，我所是中国现代植物志的源头。

今日之华南植物园（所）标本馆是一座四层楼新建筑，面积达5600 m²。馆内有中央空调，全部采用手动式密集柜储存标本，每楼层均配有电脑、体视解剖镜等设备。现在馆藏标本已超过100万份，其中种子植物85万份，蕨类植物和苔藓植物各5万份，模式标本近7000份，复份标本10万份，液浸标本6400份，并于最近完成了植物标本数据库，与全国各大标本馆合作，建立了一套数字标本馆系统，把馆藏标本全部数字化，在网上即可查阅有关标本。

创业艰难，今日之标本馆为我们提供了优越的工作条件。丰富的馆藏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今年正值华南植物研究所（园）创建 80 周年，现将我所有关采集资料收集，作一简要记述，不仅为了整理历史，缅怀前人业绩，更希望我所的优良传统能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光大。